

坚贞不屈的文化战士

□乔德春



经典作家之“左联五烈士”

20世纪20-30年代,在中国社会最黑暗时期,活跃着一批救国救亡的进步文化青年。他们忧国忧民,为了“唤起工农千百万”,以笔作枪,奔走呼号,被当时的反动当局残酷地杀害了。柔石就是被称为“左联五烈士”中的一员。

结识鲁迅,投身新文化运动

柔石于1902年9月28日出生在浙江省宁海县的一个小商人家庭。他本姓赵,名平福,后改为平复。其笔名除柔石外,还有金桥、赵璜、刘志清等多个。1918年夏,柔石考取了官费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积极向上、勤奋好学、多才多艺,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誉。

1923年夏天,柔石从浙一师范毕业,应聘到杭州当家庭教师。因与自己“教育救国”的抱负相去甚远,不到半年,他就辞教回乡。1925年2月,柔石怀着寻求真理的渴望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当了一名旁听生,有幸聆听了鲁迅先生讲授的《中国小说史略》和其文学理论,很受教育和鼓舞。1928年9月初的一天,柔石与好友王方仁、崔真吾引路,来到上海闸北横滨路景云里23号,拜见了心仪已久的鲁迅先生。此次踏进鲁迅家门,成了柔石生命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此,柔石接触到了更多进步思想的影响和熏陶,自觉地投身到了新文化运动之中。

柔石对当时时局的看法和对文学艺术的追求,深得鲁迅的喜欢。当得知柔石、王方仁、崔真吾三个进步青年居无定所后,鲁迅就慨然邀请他们居住在自己现在的房子内,而自己则搬到附近的租房中居住。考虑到三位外地年青人在上海饮食多有不便,鲁迅还特意叫他们来搭伙用膳。从此,柔石与鲁迅朝夕相处,有空就交流读书和创作的感悟,或讨论当时的社会现状和对未来社会的憧憬。鲁迅对“柔石”的笔名很感兴趣,向其原由。柔石解释:这笔名取自家乡方祠前一道小桥上题

刻着的“金桥柔石”四个字。他儿时搞不清这四个字的含义,现在感到为人处世,应该刚柔相济。鲁迅会心地点头称是:《易经》有“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老子》又有“守柔曰强”之说。只有柔中带刚,刚柔相济,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并盛赞“柔石”、“金桥”的笔名起得很好。在此期间,柔石不仅写作大有长进,而且在思想觉悟上也有大幅度提升。

鲁迅对柔石有很多关怀和帮助,而柔石对鲁迅也很尊敬和爱戴。当鲁迅阅读完柔石所著的《旧时代之死》的书稿后,对柔石的才气更是喜爱有加,赞之为“优秀之作”。他把柔石介绍给北新书局的李小峰,让其优先出版此书。柔石的小说稿《人鬼与他的妻的故事》完稿后,鲁迅成了第一位读者,觉得这部小说写得很好,决定放在自己与郁达夫主编的《奔流》第一卷第五、六期连载发表。这是柔石自学校毕业后,除了自费出版短篇小说集《疯人》之外,在像样的杂志上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

1928年深秋,柔石和王方仁、崔真吾三人商量合伙创办一个旨在介绍东欧、北欧文学,输入外国版画的进步文艺社团,出版一种刊物,每人的股金为50元。柔石一时交不出钱,鲁迅得知后主动提出帮他垫付。为使有钱好办事,鲁迅还让许广平也参加了一股。这样鲁迅用自己的稿费,实际负担全社3/5的资金。鲁迅想起《文选·陆机(文赋)》中“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的话,提出把这个文艺社团命名为朝花社,拟办的刊物也就名为《朝花》周刊。《朝花》周刊第一期于1928年12月6日面世。这虽然只是一个16开8版的小刊物,而鲁迅却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精心选用了英国阿瑟·拉克哈姆的一幅画来饰刊头,又为刊名“朝花”书写了美术字。他指导柔石说:刊物既要要求文章内容扎实,版面设计、编排形式也要生动活泼,不能搞得密密麻麻,给人压抑感。鲁迅还主张版面可以选登一幅以木刻为主

的外国美术作品,这在当时国内文艺刊物方面可说是个创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朝花社”及其《朝花》周刊,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此期间,柔石在鲁迅的指导下,搜集整理国外有关木刻的资料,编辑了《近代木刻选集》和《露谷虹儿画选》两本集子公开出版,在当时社会上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两个集子的出版,开创了我国介绍国外进步木刻艺术的先河。后来鲁迅又推荐他担任《语丝》的编辑。柔石在为“朝花社”操劳的同时仍勤耕不辍,这一年多时间,堪称是他创作的黄金时代。

柔石视鲁迅如严师和慈父,而鲁迅也确像父亲般关爱着柔石。当时上海文化界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曾讲:“我那时感觉到,鲁迅把柔石简直当作家人似的,就是偶尔看电影、游公园,或参观画展、出席会议,也总是邀柔石一同参加。”鲁迅到内山书店看望内山完造,经常与柔石同行。平时,柔石常到鲁迅房中,征询有些什么要代办的事,帮助处理一些诸如写信、寄书、汇款、取款,以及给青年作者退稿或赠书等杂务。二人之间的交往,在《鲁迅日记》里载及近百次之多。以至后来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深情地袒露,柔石是在上海“一个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办点私事的人”。同时还说道:“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

光荣入党,努力工作视死如归

柔石的所作所为,早就引起地下党组织的关注并重点予以培养。1921年10月,柔石参加了由著名新文学作家叶圣陶、朱自清任顾问,浙一师进步同学潘漠华、冯雪峰负责的“晨光文学社”,开始从事新文学运动。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后,柔石的思想受到极大震撼,他开始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并主动积极参加党组织发起的各项进步活动。

1927年秋,柔石应邀到宁海中学担任国语教师,兼教音乐和小学部的英语。宁海中学是中共宁海临时县委开展革命活动的秘密基地。在此执掌期间,柔石参加了党领导的一些革命活动。宁海地下党组织为有利于开展秘密工作,非常关注县教育局的人选,他们选中埋头教育、表面无党派色彩,其实倾向革命、同情共产党的柔石。经过努力,终使柔石于1928年初出任县教育局局长一职。柔石上任后,在掩护地下党工作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同年5月,中共宁海县委组织了著名的“亭旁暴动”,后被反动当局派兵镇压下去,宁海中学也因此被勒令解散。柔石想方设法掩护了县委特派员杨毅脱险,而自己也被转到了上海。同年12月,上海法租界电车、公共汽车工人举行罢工,上海艺大许多师生因支持罢工

而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柔石得知友人林淡秋也在被捕之列,徒步走了5里路赶到卢家湾法总捕房去探视。捕房的人告诉林淡秋已返回学校,柔石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上海艺大,见林淡秋“坐了两周的监”饿得不成样子,于是把原预备去买书的5块大洋送给了林淡秋,并约他到自己住处来暂住。

1929年秋天,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党中央决定组建一个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柔石得知后非常高兴。他在鲁迅的指导下,积极参与,四处奔波,并成了12名左联筹备组成员之一。1930年2月,柔石和鲁迅、冯雪峰一起出席了上海新文学运动者讨论会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同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在中华艺术大学秘密召开,柔石被选为执行委员,不久又任常务委员兼编辑部主任。

经过地下党组织的培养教育,柔石已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1930年5月,经上海文化界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冯雪峰、黄理文介绍,柔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党的一些主张,有时就通过柔石转达给鲁迅先生,柔石成为了我党与鲁迅联系的一个桥梁。不久,柔石和胡也频、冯铿一起,以左联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作为一个革命家,柔石积极参加党领导的一切革命活动,而且旗帜鲜明地参加了党内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1931年1月17日,他参加在上海东方饭店举行的讨论王明路线问题的会议时,因叛徒出卖,遭到反动当局军警逮捕。23日,他被移送到国民党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牢房,被钉上重达10多公斤的铁镣——“半步镣”。在狱中,柔石坚贞不屈,与反动当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并暗中做通狱卒的工作,先后送出两封信件,向鲁迅和战友们通报相关情报信息,暗示他们及早转移。两封信件均辗转送达鲁迅手中。2月7日夜,反动军警将24位革命同志仓促行刑,柔石头部和胸部连中10弹,壮烈牺牲,享年29岁。

柔石被反动当局残杀的噩耗传来,鲁迅深为震惊和悲痛。他打破从未给别人写过传记的惯例,为纪念这位热血青年,写下了《柔石小传》。同时还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墓》等悼念文章,在白色恐怖中放声呐喊:“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鲁迅始终不能忘怀这位革命青年战士,两年之后,他又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倾吐了对柔石等五位革命青年作家的深厚情感和思念。“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战士。”在极度的思念和悲愤中,鲁迅还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悼柔石诗”:
“惯于长夜过春时,妇孺皆谓有丝。梦里依稀慈

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此诗既是悼念英雄的催泪挽歌,更是在黑夜中炸响的催征鼓点,可谓感人至深,影响深远。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于1950年4月组织力量将柔石等24位烈士的忠骨挖掘出来,移葬大场公墓。1968年又专门修建了“龙华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高高耸立,象征着革命先烈们的精神高大伟岸,万世永垂。

以笔作枪,唤醒工农千百万

柔石在文学事业上成就斐然,一生共留下55万字的创作作品和63万字的译作。主要创作的文学作品有小说《旧时代之死》《人鬼与他的妻的故事》《二月》《为奴隶的母亲》《三姊妹》《希望》等,散文集《希望》和两部独幕剧以及大量的诗歌等;翻译有卢那卡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戈理基的《阿尔泰莫诺夫氏的事业》以及《丹麦短篇小说集》等多部。这些作品已列入世界文学的宝库,先后被译成日、英、俄、法、德、泰、印等多种文字,赢得了国外读者的喜爱和好评。对繁荣我国的革命文艺创作,推进新文化运动和扶植新生的木刻艺术有着不朽的功绩。

在柔石众多文学体裁的作品中,其小说最为突出。小说中又以《为奴隶的母亲》和《二月》最具代表性。《为奴隶的母亲》在1930年3月在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不久,被蒋光慈编入《现代中国作家选集》。1934年,英国的马丁·劳伦斯书店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也将它收入。1936年,美国德加·斯诺编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将它列为鲁迅以外的“其他中国作家小说的首篇”。当年中国左联驻国际作家联盟代表萧三曾在1945年1月29日写的《哀悼罗曼·罗兰》中提到,罗曼·罗兰在从《国际文学》法文版读了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后,曾写信给该杂志的编辑部说:“这篇故事使我深深地感动。”

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是柔石创作思想和艺术技巧日渐成熟的标志,达到现实主义高度的代表作。小说通过描写农村穷苦民众的生活,揭示社会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作品通过对农村劳动妇女悲惨经历的描写,竭力诅咒了罪恶的“典妻”陋习,曾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中篇小说《二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该作品以江南小镇为背景,描写了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苦闷、彷徨及对命运的茫然。小说以萧涧秋在去往芙蓉镇任教的船上听到文嫂的家庭悲剧为主线,引出了不同阶层对此悲剧的作为。以文嫂对生活的无助,反映出社会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可以说,该作品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越了文学价值。

(作者单位:四川省法治文化研究会)

论胡也频的社会剧创作

□邱霞

1935年出版的洪深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九集《戏剧集》中。

彭耀春认为胡也频的戏剧创作可分为爱情剧和社会剧两类:他的爱情剧中表现青年学生、教授、画家、职员等知识分子的爱情生活,着意于对五四时代“个性解放”、“婚姻恋爱自由”大潮的冷静反思,通过“痴心女子负心汉”的现代模式和新人旧道德的对比反差,掀开生活的面纱,鲜明地揭发出在新装束新名词下旧道德的复辟。同时,胡也频也是一位社会感很强的剧作家,他戏剧创作的视野还扩大到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从下层社会的贫困愚昧、中层社会的自私贪婪,到都市工人的饱受压榨和终于抗争,触及到当时中国民族矛盾、劳资冲突、贫富对立等社会生活的本质(彭耀春《胡也频戏剧创作简论》)。

诚然,胡也频戏剧根据题材可分为表现自由与爱的生活剧和揭露黑暗与丑的社会剧两类,其社会剧以《瓦匠之家》《资本家》《幽灵》和《绅士的请客》四部剧作为代表。他把戏剧的笔触深入到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深入揭露日益凸显的阶级矛盾,生动勾画了为富不仁者的丑陋嘴脸,高度颂扬了社会底层人民不屈的抗争精神,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批判精神、愤懑的反抗情绪。胡也频成为左翼戏剧运动初期的一支生力军。

胡也频之所以创作多部揭露阶级矛盾等的社会问题剧,转向左倾、走向革命,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贫苦出身。胡也频从小经历了饥饿、寒冷、屈辱、孤单,过着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见惯了贫苦大众为求得生存而痛苦挣扎的场景,对造成这种现状的黑暗社会充满了愤恨与反抗。

他的《瓦匠之家》就是“想用写实的手法,去写出那中下层社会的困苦生活的”(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 戏剧集 导言》)。《瓦匠之家》描写了城乡下层劳动者的非人生活,剧中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非常好赌;父亲是个瓦匠,嗜酒成性;女儿阿红在富家为仆,她备受女主人虐待,还要躲避男主人的非礼,每月少许欠款还被克扣大半。阿红

不愿再去帮佣,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父母咒骂殴打女儿,全剧在阿红“我去!我去!”的哭声中落幕。该剧通过阿红的悲惨遭遇的叙写,发出了对丑恶社会的控诉,同时也对阿红父母的愚昧、贪婪和堕落进行了批判。胡也频曾有着与阿红相似的遭遇。他15岁时曾在老家一个金店当学徒,终日劳累,常受老板、大学徒们的刁难和欺凌。更有甚者,他还被诬陷偷走戒指,被老板捆在房柱上威肋、敲打。尽管后来洗清嫌疑,他却没得到一声道歉。这种凄惨经历使胡也频对绅士等社会有钱阶层无耻、丑恶的嘴脸有着直观、清醒的认识。如果说《瓦匠之家》是从侧面写出了有钱阶层的腐朽本性,那么,他的《绅士的请客》

一剧就以辛辣的笔法直接嘲讽了绅士及其太太的狡诈吝啬的丑态。绅士一时兴起,邀请36人做客,夫妻以为客人最多只能来到20多位,吝啬的太太让厨子只准备一桌的食材。谁知客人全部来到,绅士夫妻气急败坏,互相埋怨,最后只得忍痛拿出五块钱再办一桌。剧中厨子和听差时常露出的鄙夷神情和讥讽语气,这何尝不是胡也频内心的写照呢!

胡也频创作社会问题剧,第二个原因是普罗文化运动的大社会背景。话剧舶来之初就起着宣传教化、启蒙民智的作用。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明确倡导“写实主义”,号召戏剧作品要针对时弊、揭批黑暗。五四社会问题剧的出现恰逢其时地承担着自由平等的启蒙重任。1921年成立的“民众戏剧社”就明确提出“为人生”的“艺术上的功利主义”主张。胡也频是五四时期诞生的知识分子,文艺“为人生”的思想深入骨髓。他在1924年12月与项植等合办《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时,就明确倡导“为人生”的艺术主张,这个刊物的宗旨是:“艺术原是人生的表现”,反对“专以吟月弄花”“纯粹的艺术”和“为艺术”的倾向。洪深曾评价说:胡也频的《瓦匠之家》“多少是受了民国十四年以后‘第二次着重社会作用’的影响”(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 戏剧集 导

言》)。尽管此时文化界并没有明确提倡“普罗戏剧”和“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但是强调戏剧的战斗性和阶级性,认为艺术与政治应当密切相关已经成为众多左倾戏剧家们的共识。

胡也频曾长期身处政治漩涡之外,大革命失败后,他也苦闷、彷徨过。冯雪峰的的出现,是胡也频向左转向的关键人物。胡也频在1927年底,与作为共产党员的冯雪峰结识,冯雪峰对胡也频的影响不言而喻。在1928年前后,胡也频通读了大量的鲁迅和冯雪峰翻译的苏俄文艺理论书籍,进而读了一些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书,对革命逐渐有了理解,逐渐左倾。他的《资本家》(创作于1927年12月)和《幽灵》(创作于1928年2月)两部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国家腐败、人民苦难的罪恶之源——资本家阶层,剧中的下层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已经开始觉醒并走上反抗之路。

《资本家》里的棉纱厂厂主富成谷宁愿停产,亏本十万二十万,“只当是交易所的一次失败”,也不愿答应工人们适当提高工资、减少工时的合理要求。工人代表们据理力争,最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由和平谈判发展到焚烧厂房。这表明工人阶级开始觉醒,他们的力量渐渐长大,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剧中的造膜厂厂主耀温是个非常开明的资本家,他的存在既是与贪婪顽固的资本家富成谷作对比,同时也是表明剧作家对当时尖锐的劳资矛盾认识不够深入。

《幽灵》是胡也频一部比较另类的剧作,剧中一群死者在“幽灵”的世界里相遇,他们分别是工人(为工作而死的)、兵士(为打仗而死的)、诗人(为悲哀而死的)、著作家(为忧郁而死的)、舞女(为愤怒而死的)和乞丐(为饥饿而死的)。通过交谈,他们发现自己是一群同样不幸的人,只有团

结起来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剧作在他们企盼一个和平、幸福的时代早日到来的欢呼声中落幕。该剧如梦幻般的场景,类型化的人物以及尖锐怪异的风格,明显受到西方表现主义戏剧的影响。1920年代的中国作家将表现主义戏剧大致分为两类:以斯特林堡为代表的“自叙剧”,和以托勒、凯泽为代表的“叫唤剧”。这种“叫唤剧”带有强烈的左翼色彩,是“为热情所唤起而直接表现自我”的情感流露(胡星亮:《二十世纪中国戏剧思潮》)。诚然,《幽灵》受到斯特林堡《一出梦的戏剧》、《鬼魂奏鸣曲》的影响,但对其产生影响最大的是德国表现主义戏剧家托勒(托勒尔)的《变形》(1918年)和《群众与人》(1919—1920年)两剧。《变形》系托勒尔的第一部剧作,在题为“死者的兵营”的序幕里,战争时期的死者与和平时期的死者在公墓里争吵起来。第二场里,士兵们的骷髅匍匐地穿越一道铁丝网组成的障碍物。《资本家》和《幽灵》两剧标志着胡也频“普罗文学”创作阶段的开始,之后,胡也频暂时停止了戏剧创作,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到莫斯科去》(1929年)和《光明在我们的前面》(1930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尽管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在创作小说和诗歌、编辑报纸副刊之余,胡也频创作了9部剧作,这在1920年代的剧坛也算是比较可观的。胡也频的戏剧创作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他的剧作题材广泛,涵盖情感婚恋和社会政治两大类型;人物众多,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底层大众、知识分子和资本家阶层;作品风格各异,既有写现实主义的社会问题剧,也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实验之作;剧作美学风格鲜明,一般来说,他的情感生活剧多为喜剧,其中既有表现“人生愉快”的幽默喜剧,也有批判揶揄的讽刺喜剧,社会政治剧则大多是“表现人生悲哀方面”的悲剧和带有明显悲剧意味的正剧。胡也频对后一类剧作未能上演表示“惋惜”,是他认为“看不懂悲剧的观众”会“忽略去人生最大的悲的一面”,这是一种“阻碍戏剧发展的恶习”(胡也频《捉狭鬼》序)。这种思想与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劣根性批判是一脉相承的。

(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